

新中国 70 年党的领导集体对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王 瑶 郭冠清 黄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实现了中国经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对于这一历史变迁,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逻辑主线,结合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三个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如何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揭示。

关键词: 新中国 70 年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9)12-0014-011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19.12.003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旧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战乱的创伤下以及在新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实现了年均 GDP 7.98% 的高速增长(郭旭红,2016),而且为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站起来”了^①。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限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推动下,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中国“富起来”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

收稿日期:2019-11-13

*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 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本论》研究优势学科建设”课题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瑶(1981-),男,辽宁朝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经济思想史;郭冠清(196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资本论》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黄志刚(1971-),男,江西景德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史。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中国经济“站起来”的标志是我国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虽然“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建设,但是依然对工业经济体系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三线建设”。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进行了讨论,后者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本文观点给予了佐证。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新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正在带领中国这艘巨轮进入“高质量发展”“强起来”的新阶段。

对于这一历史变迁,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逻辑主线,结合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三个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如何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揭示。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建国初期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战略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通过这条发展道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一)为什么要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层次理论思考,并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思想,那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走国家工业化道路,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落后挨打的状况。在 1945 年 4 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重大而陌生的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对中国生产力所处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后,选择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快速发展工业化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道路。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两个五年计划快速实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产值,建立了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苏联的成功实践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以俄为师”不仅可以减少试错的成本和制度设计的成本,还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这一点可以从“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明显地看出。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长期负责中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会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深刻地指出,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不足,五年计划的财力非常有限,如果平均使用,必然一事无成。如果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等各种运输设备。虽然扩大轻工业可改善人民生活,但实际上当前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除了缺少农业原料外,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②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通过借鉴苏联经验使政府集中控制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并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赶超型国家很难通过自发的市场经济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从理论上讲,这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的基础上,寻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在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具体应用(郭冠清,2015)。从实施效果看,“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集中力量进行了 694 个大中型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9—1100.

② 朱佳木.陈云和他的事业(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87.

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陈文福,2003),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工业化大厦正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728亿元^①,并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主导下的成功积累,我国能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全世界工业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为计划经济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埋下了伏笔,对“理性设计”的过多迷恋和对经济成就的过高估计,引发了1957年“反右”的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从而使得计划经济的优势还没有像苏联那样充分绽放出来就走向了衰落,以致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比建国初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得不在“贫穷”中挣扎(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2019)。

(二)如何统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要对农业实施粮棉油统购统销,这是因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不得不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而从农业中提取。正如陈云所讲,“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②过度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还遇到一个与苏联相同的问题,就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难以发展,城镇化也难以赶上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对此,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在这篇被邓小平倍加推崇的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③关于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④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度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关系,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⑤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还做了辩证的分析:“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⑥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陈云也注意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综合平衡思想。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注意到苏联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在快速工业化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并由此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统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的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缺陷带有内生性,是在非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按照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种缺陷在苏联、东欧和我国的实践中无一例外,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迄今为止,尚未找到能够突破科尔奈“供给短缺”的可

① 王立胜,赵学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70年全景实录上卷[M]. 济南: 济南出版社,2019: 616.

②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97.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24.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24.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240—241.

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241.

行之路。

(三) 社会主义究竟是否应该进行商品生产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模式，那么还需要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吗？陈云最早对它进行了回答，认为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情况下，更能发挥计划经济的作用，更容易实现综合平衡。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生产。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关系做出系统论述的不是陈云而是毛泽东，尽管从提出时间看，陈云更早一些。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批判了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而且还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②对于这一论述，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言，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开来，突破了恩格斯公式^③、斯大林对恩格斯公式解释的限制，从理论上，破解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利用商品生产的历史性难题（吴易风，2004）。

遗憾的是，理论上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上我们能做得很好，商品生产在我国几乎没有建立起来，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以及横扫“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已经被扼杀了。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我国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依然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贫困陷阱”，197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富裕国家的6.8%，世界平均水平的22.1%（蔡昉等，2018），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萧冬连，2014），大批返城的知识青年找不到工作，贫穷与落后依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限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

(一)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着双重约束，一是重工业优先战略带来的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不足，除

① 陈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9.

③ 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随即消失。

重工业以外生产力水平依然非常低下,这一点与苏联解体前非常相似,由于轻工业和农业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休戚相关,消费品短缺引发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意味着我国并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贫困陷阱”。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何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摆在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尽管毛泽东逝世后,接班人华国锋有着强烈的愿望发展经济以改变现状,并在“轻工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两个凡是”反映出来的思想禁锢和“洋跃进”带来的物价上涨等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没有思想方面的解放,没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延续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摆脱“贫困陷阱”几乎没有可能。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看出。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讲道:“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方式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

为什么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呢?科斯和王宁(2013)在《变更中国》中将其原因归结为是一场农民自发的产权清晰的“边缘革命”所引起。农村的变革确实解决了人民公社不可避免存在的“激励问题”,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应该看到,“包产到户”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过去曾多次出现过,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末合作化高潮时出现过,60 年代初期经济困难时期也出现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出现过^②,而且邓小平、陈云都亲历过,都非常清楚它在一定阶段对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的原因只能从其他方面去找,本文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带来的宽松政治环境、1978 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的激励作用和包产到户对家庭的激励作用才是关键。从理论上讲,就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而言,至少在大部分地方,相对于“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制度这种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利用所带来的收益低于协调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按工分计算的平均主义也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③。换句话说,对大部分地方来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④

农村的改革在邓小平的肯定下,逐渐发展起来。他在 1980 年 4 月 2 日、1980 年 5 月 31 日两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了支持^⑤。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贵州省在 1980 年 7 月 15 日发文,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制,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对家庭承包制的支持(曹普,2016)。在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后,1983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由此奠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蔡昉等,2018)。到 1983 年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产队高达 586.3 万个,占生产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1.

② 不过,与包产到户不同,包干到户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第一次出现。包产到户以生产队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生产计划、统一重大生产措施、统一处理产品和收益分配)为基础,而包干到户则是生产队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农民在“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之后“剩下全是自己的”。

③ 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参见郭冠清(2015)。

④ 这里强调大部分地方,主要是迄今为止,还有许多地方保留着农村集体耕作制的生产方式。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总数的 99.5%，其中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 576.4 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 97.8%。^①

农村改革的副产品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 1984 年以前叫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集体（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兴办企业的总称，毛泽东曾对社队企业给予了很高评价。根据当代研究所（2012）的研究，到 1978 年，我国的社队企业数目为 152.42 万个，从业人员 2826.56 万人。虽然 1979 年我国出台了关于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到了 1980 年社队企业单位数比 1979 年还减少了 9.96 万个。而伴随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带来的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导致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到 1984 年底，乡镇企业达到 606.52 万个，比上年增加了 3.5 倍（比 1978 年增长 2.98 倍）；就业人数达到 5208.11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73.47 万人，增长 61%；上缴国家税金高达 79.1 亿元，占整个国家税收的 8.3%。邓小平高度赞赏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他在 1987 年 6 月 12 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讲道：“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②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其说是制度设计的产物，不如说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家庭承包制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推动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发产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忽略，以及乡镇企业存在的“激励不相容”等内生缺陷，加上许多农民走出去闯世界的愿望，使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踏上了离乡背井去城市淘金的道路，而正是这些半无产阶级产业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铸就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蔡昉等，2018），同时也使农村在经过了一段飞速发展之后（主要是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停滞和徘徊不前，逐渐陷入了困境。

（二）国有企业和价格的渐进式改革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城市改革也悄然兴起，改革主体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和由政府控制的价格。

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存在类似农户家庭可以分割的效率个体，这种改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降低改革的成本，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选择了“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试验，1978 年 10 月我国在四川省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械厂等六家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方向的改革。截至 1980 年底，全国扩权试点企业已达 6600 家，约占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 16%，而到了 1982 年底，全国有 80% 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经济责任制。从 1978 年到 1984 年为期六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发展生产，搞好流通，都有积极的作用，财政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长，从 1978 年的 347.1 亿元增加到 1984 年的 1118.5 亿元（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通过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点，并明确了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于是，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力量在减弱，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也在发生变化，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① 根据本文作者对东北、华北的实地调研，北部地区实行“包干到户”普遍较晚，大部分是在 1983 年春天才开始进行。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8.

“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开始纠正,从 1984 年 10 月开始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经理)负责制。^{①②} 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经理)负责制,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选择,是在当时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由此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已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进一步需要,客观上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理顺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

价格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定价模式,在不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前提下,给市场主体传递有效的信号成为价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实践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渐进式改革的双轨制制度设计,在未引起生产力水平下降(其直观表现为没有年份出现经济负增长)的前提下,完成了平稳的过渡。尽管经历了 1988 年价格闯关的困难、双轨制引发的“寻租”腐败等问题,但相对于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是非常成功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和价格逐渐放开,到 1980 年代末期和 1990 年代初期,一方面,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已基本消除,国有企业已初步成为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由市场为主调节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消费资料价格已由政府直接定价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转向市场调节价格(如 1990 年就已超过了 50%),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已由双轨制转向了市场单轨制,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问题越来越突出,改革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逐渐暴露,改革的边际收益明显地减少,而在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剧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误区,引导我国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新阶段。

(三)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突破

对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进行商品生产的问题,如前所述,陈云和毛泽东在上世纪 50 年代都曾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云在 1979 年 3 月 8 日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又做了进一步探索,可以看做是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先声。对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邓小平早在 1985 年 10 月会见英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说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③。1987 年 2 月 6 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十三大报告稿的起草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日本就有一个企业厅吗,美国也有计划吗。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④在 1991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视察上海时邓小平明确讲到,“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⑤1992 年 1 月

① 主要数据来源于黄群慧的《“新钢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蔡昉等,2018)。

② 根据当代研究所(2012)的研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经理)全权负责制应该起源于 1984 年 5 月 18 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149.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7.

18 日—2 月 21 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深刻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①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关键是看哪种资源配置方式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构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方式等),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夺目的光环,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尤其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求,使得我们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等系列问题,邓小平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两极分化的论述,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与其说是执行层面的偏差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所致。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突破了“贫困陷阱”,而且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增长的奇迹。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不仅存在着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成长的烦恼,而且处在“三期叠加”^②的重要窗口期,面临着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正在带领中国这艘巨轮进入“高质量发展”“强起来”的新阶段。

(一)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理念

新中国建国 70 年来,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由于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和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不同,形成了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理念:以“赶超式为主”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什么要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下,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如上述所说的变化,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资源消耗已不足以带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也很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将创新作为驱动力,中国经济不仅无法保持高增长甚至中低增长速度,而且可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供给严重短缺”的阶段不曾遇到,而且在人口红利尚在、资源尚可耗费、“三驾马车”动力尚足的阶段也无关宏旨。“创新”肩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任的,必须紧紧抓住的“牛鼻子”^③。换句话说,创新已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避免经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选择。^④

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也遇到一定的问题,例如,绿色发展理念,本身是很好的理念,但是在一些地方,由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执行中的问题,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一点可以从 2018 年为了环保关闭大量的养猪场,由非洲瘟疫诱发 2019 年猪肉价格飞涨中看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② “三期叠加”指的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③ 冯文雅.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0.

④ 进一步分析论述,参见郭冠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J].社会科学辑刊,2018(05):44-54+2.

(二)为什么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需求侧管理政策作用已大大减弱,货币政策的刺激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边缘,货币常常改道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泡沫。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还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挤占效应”;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相继出现,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移^①;第三,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已经连续 5 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中的投入品即生产消费趋向升级(裴长洪,2019)。

总的来说,我国在跨越“贫困陷阱”的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经不复存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满足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单靠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办法已经无法做到,需要寻找新的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安排,以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除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别无选择。

当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益再分配等问题,在理论上存在着政府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存在着过度干预市场、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由此,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推进这一举措仍然是一个难题。

(三)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制度的设计一直是重中之重,如何在已有的生产力约束条件下,选择合适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经济体制设计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点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不例外,例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历史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重塑,提出了“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新理念,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突破。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做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②

至于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体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了明确说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对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指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在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划分上也非常明确,“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

^①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袁富华,陈昌兵.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50(11):4-19.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99.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则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进行决策和管理。”^①

至此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为新时代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党、政府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新的治理体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还要通过发挥党的领导来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何发挥党、政府、市场各自优势上,尽管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实践层面可能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例如,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结果很可能是政府用带有“理论设计”色彩的预设去干预经济。因此,在实践层面,如何清晰地界定党、政府和市场的效率边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结 语

如何科学地揭示新中国建立以来 70 年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很难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而且还往往用我们现在的认识去理解我们不曾经历过去,结果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如果忽视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忽略毛泽东在对外开放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能会使我们误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时代。在揭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由于缺乏对中国经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深度理解,简单地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归为“产权清晰化”过程,并用四次“边缘革命”来揭示中国经济转型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动机。

基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史的梳理,本文发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解释具有其他理论无法比拟的优势。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如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了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能理顺,经济就会快速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选择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计划经济模式,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顺利实现了可能在盲目自发的市场经济中几百年都无法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而相反,当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时,危机就发生了,以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依然还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按照生产力水平的条件,创造性地选择了一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使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产生经济发展奇迹就是因为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创造性作用,这不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原理的具体运用吗?虽然市场经济有各种缺陷,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如何设计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尤为重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带领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① 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2017:19.

参考文献:

1. 郭冠清. 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J]. 经济学动态, 2015(5):22-29.
2. 郭旭红. 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4):164-177.
3. 陈文福.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探索[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3(1):112-115.
4. 金星晔, 管汉晖, 李稻葵, BROADBERRY Stephen.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 1000—2017 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J]. 经济研究, 2019, 54(7):14-29.
5. 吴易风. 历史性理论难题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J]. 当代经济研究, 2004(8):3-9+73.
6. 蔡昉等.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18)[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 萧冬连.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8. 科斯和王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9. 郭冠清.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10):5-18.
10. 王小鲁. 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1. 曹普.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2.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 裴长洪, 赵伟洪.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J]. 经济学动态, 2019(4):3-17.
14. 简新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探索[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9(5).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Roa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WANG Yao GUO Guan-qing HUANG Zhi-g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836)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n 70 years ag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made arduous exploration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which realize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om standing up and getting rich to becoming strong. For this historical chang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with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main logic line as well a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economic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oose the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each history stage. The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revea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Key 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 Xi Jinping